

# 明代居庸關隘口城鎮的發展 ——以白羊口堡城為中心（1449-1572）

張程娟  
中山大學歷史系

## 一、引言

學界關於明代城鎮的研究成果豐富，涉及到區域性的城鎮研究，主要有江南地區的市鎮，運河沿線的城鎮，北京城、廣州城等較大城市，探討這些區域的城鎮興起發展的區位優勢（交通等因素）和社會機制，目前關於明代九邊沿線的城鎮發展的研究還不是很多，對其興起的社會原因的探討也鮮有研究。

本文便以明代居庸關的一個隘口堡城——白羊城為例，探討其在明代中後期發展的過程。本文以位於今天北京昌平區白羊城村的四塊撰寫時間集中在明代嘉靖四十三年至隆慶六年（1564-1572）的碑刻<sup>1</sup>為主要材料，並結合《西關志》、《重修居庸關志》等文獻，認為從土木堡之變到隆慶初這段時間內，白羊城發展變化過程是，正統十四年（1449）前為「村」，景泰元年（1450）建為軍事防禦性的「所城」，後逐漸發展為人群複雜且建有城隍廟的城鎮。

本文之所以將時間限定在正統十四年到隆慶六年之間（1449-1572），因正統十四年之後，白羊城有一個由「村」到「所城」的變化，至於隆慶六年，是明代與白羊城有關的碑刻中最晚的年代。<sup>2</sup>從隆慶六年的碑刻中也已經能看到，白羊城已然不僅是軍事防禦性的「所城」，此段時間可以反映明代中後期之前白羊城的大致發展過程。

另外，通過分析碑刻所反映的資訊，可以看到明代發生的一些大事如「土木堡之變」、「庚戌之變」及其帶來的北邊軍事防禦體系的變化對白羊城造成的影響。

## 二、防禦「所城」：土木堡之變後建城設所

明代居庸關所轄隘口分為中路隘口、北路隘口、南路隘口、東路隘口、西路隘口，白羊口隘

口屬於西路隘口。元代的白羊口屬於大都路昌平縣，有千戶所<sup>3</sup>，可知早在元代白羊口就已是軍事防禦要處。明朝建立初期，屬北平府，又據《重修承恩寺記》記載，白羊城「先年（正統十四年）之前止名村」<sup>4</sup>，但其東接居庸，西連紫荆，尤為要害。正統九年，也先曾由此入犯。<sup>5</sup>又，「己巳之變，虜常由此深入」，<sup>6</sup>土木堡之變時，白羊口是蒙古軍深入京師之路，此事件後朝廷意識到白羊口地理位置特重，「南肩長裕，北跨居庸，西聯上谷，南拱神京，定藩籬之屏壁疆國鼎要之地」，<sup>7</sup>需要加強此處的防禦。據《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記載：

自正統己巳（正統十四年），英廟北狩，郟邱監國，虜馬牧懷甯，居庸戒嚴，白羊特重，設官建城，撥所守禦，蓋畿輔之鎖鑰也。<sup>8</sup>

又，《重修承恩寺記》記載：

自正統末時，北寇突此。始於景泰二年，建城設所，撥調官軍，守禦於斯，以扼其患。<sup>9</sup>

景泰二年，朝廷撥調官軍到白羊口，並在此建城設所。「景泰年間，該廣甯伯劉安奏，調涿鹿中千戶所官軍一千餘員名，就築白羊口堡，擬截虜犯。」<sup>10</sup>白羊口成為一個駐紮涿鹿中後千戶所的軍事「所城」，駐有官軍一千餘名。新建的白羊口城「上跨南北兩山，下當兩山之沖，城高二丈五尺，厚一丈二尺，周圍七百六十一丈五尺。東西城門樓二座，冬月城門一空，敵樓四座，水旱門五空，城鋪一十五間，護城墩一十二座。」<sup>11</sup>

明初在兵力配備上加強城堡防禦的重要措施，是在當地新建衛所或守禦千戶所，以衛所分兵守衛鄰近城堡，遷衛，調內地備禦班軍赴邊守衛所城堡等。<sup>12</sup>明代居庸關還有其他類似白羊口堡城的城池，如永樂二年（1404）建居庸上關城、南口門堡城，景泰元年建鎮邊城，景泰四年（1453）建渤海新、舊營城二座，弘治十八年建橫嶺城、八達嶺城，正德十五年（1520）建長裕城，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黃花鎮城，隆慶五年建岔道堡城。<sup>13</sup>

這些堡城下設有墩，白羊城下就有十座墩，均為軍事防禦性的建置。「收保之法，大者為城，其次為堡，再次為墩。雖大小不同，必須高堅深厚，方能賴其保障。」<sup>14</sup>此外，明代在各府州縣關津要害之處都設巡檢司，司有巡檢、副巡檢，掌緝捕盜賊，盤查奸偽等。<sup>15</sup>白羊口在弘治十八年前便設有白羊口巡檢司。<sup>16</sup>

白羊口建城之初，堡城的守城兵主要是景泰元年調來的涿鹿中衛後千戶所官軍，此千戶所有兵一千餘員，永樂十一年（1413），建涿鹿中衛領左右中前後五所，駐守在涿州。涿鹿中衛後千戶所設有千戶四員，百戶八員。<sup>17</sup>守禦千戶所是明朝衛所制度中的一種特種編制，不隸屬於衛，直屬都指揮使司，設官與一般千戶所同，正千戶一人，副千戶二人，鎮撫二人，下轄十百戶所，共百戶十人，總旗二十人，小旗百人，且自衛指揮以下其官皆世襲，即軍士亦父死子繼為一代定典。<sup>18</sup>

按照明代的鎮戍制度，「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sup>19</sup>守備主要是重要城堡的防守將領，「有專城之責」<sup>20</sup>。守備在明初已經設立，一般隸屬於參將，其地位低於遊擊。弘治十八年時，白羊城添設白羊口守備指揮一員，監制長裕、橫嶺、鎮邊三城，統領三地把總。守備將領統領守城兵主要有三項任務：第一，防守本城及附近轄區；第二，服從本鎮及鄰鎮的戰事需要；第三，防禦盜寇。前兩項是針對蒙古等，屬邊防任務。<sup>21</sup>以上，可以看出白羊城在新設立的時候，是一防禦性的衛所堡城。

白羊口的軍事防禦性特點，一方面體現在衛所系統，一方面則體現在省鎮營兵體系中。另外，建城之後，白羊口城除了主兵還有客兵防守。「歲時督修守勤勞，春秋駐客兵防衛，」<sup>22</sup>「歷代白羊城為都藩要地，主客戍守居多。」<sup>23</sup>《明史》記載「初，太祖沿邊設衛，惟土著兵及有罪謫戍者。遇有警，調他衛軍往戍，謂之客兵。」<sup>24</sup>遇重大邊警，調他鎮之兵幫助戰守，叫作客兵。客兵並不定期，因警而遣。還有一部份餘舍，夏天屯種，冬天防守。但明代初年，白羊口城的客兵主要指的是哪裡的軍隊，暫時還不清楚，不同時期的「客兵」來源不同。（下文將詳述明代中後期的「客兵」）

儘管白羊城最初建立之時，為防禦性的衛所堡城，但在景泰二年調所建堡之前，白羊城「止名村」，已經有本地人居住，一直到隆慶年間，仍可見本地人的身影，據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記載「鄉耆王得水暨眾信人申穩、李明、張萬等各施己財，奔走於役，不疾不徐，而告成焉。」可見，這些「鄉耆」或許是當地人，時有駐防此地的軍隊，建廟「保本城內外大小軍民人等」<sup>25</sup>，可見當地軍民雜處的情形。

### 三、建立寺院、社學：正德初年到嘉靖二十九年的發展

土木堡之變後，朝廷調撥軍隊，白羊口建築「所城」，直到正德初年，白羊口城較為安定。據《重修承恩寺記》記載：

一自創城之後，胡馬無侵，仕民晏然，歲稔物孚，於是稟感神天陰中庇佑，正德丁卯（正德二年）眾誠一舉處，擇城內西南阜地一區，勢甚崇巍，夷置口基，創建佛殿三間。<sup>26</sup>

白羊口自景泰年間建城後，仕民晏然，沒有受到蒙古軍侵擾，並於正德二年（1507）在城西南高地，創建承恩寺。正德八年（1513）時，曾將京營下班官軍選撥五百名到白羊口。<sup>27</sup>在正德十一年（1516），小王子犯白羊口，<sup>28</sup>此城情勢

危急，加之「（白羊口）本堡雖有一所官軍，自有本地方操備差估，近亦多名存而實亡矣。」<sup>29</sup>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屠僑指出「白羊口堡外、橫嶺等口，已經驚擾者人人畏縮，將何所賴？緊要之機，惟在於守，」<sup>30</sup>提議在白羊口堡城等地添設軍士，以防邊秋後爲重。至正德十一年，此地仍爲軍事要害，調兵加強防禦。

王士翹的《西關志》成書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據其記載，可以看到白羊城在嘉靖二十七年之前的狀況。白羊城的建置逐漸完善，白羊口堡原額馬89匹，修建了白羊口堡羊頭墩，在城內南山坡有倉場一所，城東門外山坡有草場一所，城西南門外有白羊口堡校場，白羊口神機庫一所，計九間，另有社學一所。城內有察院二所，守備公廨一所，千戶所一所。從倉場、草場、校場、神機庫及千戶所這些建置，可見白羊城的軍事防禦性堡城色彩。

又據《西關志》記載，白羊城軍814名，馬隊旗軍82名，步隊旗軍411名，鼓手軍65名，火藥匠軍八名，夜不收軍65名，東門守把軍15名，西門守把軍15名，倉草場軍24名，神器庫軍十名，磚灰窯軍19名，清泉口軍14名，松湖片口軍八名，守城軍41名，護城墩軍七名，看監軍禁六名，看鋪陳庫子一名，老弱軍23名。<sup>31</sup>衛所軍戶除了守護城堡之外，還有各項雜差，負擔較重，多有逃亡。從原來涿鹿中後衛千戶所一千餘名土軍，到嘉靖年間，還剩下814名，可見，有一百多名土軍或逃亡或脫軍籍，或以另外的身份生活在白羊城。比如在《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碑陰記有87名「義男」，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記有「家人」四名。可以推測，或許在嘉靖中後期便開始有軍戶雇傭「義男」代其服役，而軍戶可能會從事其他營生。<sup>32</sup>（下文將詳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年間白羊城建立了社學，並請衛學生員一人訓蒙，撥給軍二名看守。<sup>33</sup>據《明會典》記載：「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十六年詔民間立社學，有司不得干預，其經斷有過之人，不許爲師，二十年，令民間子弟讀御制大誥，又令爲師者率其徒能誦大誥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

第給賞，又令兼讀律令，正統元年，令各處提學官及司、府、州、縣官嚴督社學，不許廢弛，其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成化元年，令民間子弟願入社學者聽其，貧乏不願者勿強，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訪保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sup>34</sup>

在弘治十七年後，民間社學本應由府、州、縣建立，白羊城並非府州縣的行政級別，建立社學實爲禮制規定之外，據《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記載，「先建社學，隆師以聚生徒，是育才爲翌日用。」<sup>35</sup>此社學乃爲守備張涇在白羊城任職期間所建，並有軍人看守。遲至嘉靖二十七年，白羊城建立社學，而非建立衛學，說明白羊城人群漸爲複雜，調到此處駐防的正軍可能攜帶軍餘，軍餘無職可襲，入學讀書的目的在於參與科舉考試。<sup>36</sup>不設衛學，亦可說明白羊城已非單純的衛所堡城。

可以推測，白羊城調撥軍隊建城，是一個軍事防禦性質的「所城」，從正德初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軍事建置逐漸完備，調到此處的官舍軍餘，人口漸繁，白羊城的獨立性增強，效仿縣城，建立社學。同時堡城內也出現了軍人逃亡，雇傭「義男」代役的情況，堡城內人群身份複雜化。

#### 四、從「所城」到城鎮：庚戌之變至隆慶初年白羊城鎮的形成

筆者試圖在此節中集中使用坐落在白羊城的幾塊碑刻，它們的撰寫樹立年代集中在嘉靖三十年（1551）至隆慶六年。一方面，從這些碑文及碑陰所記載的捐助者，考察在嘉靖三十年到隆慶六年<sup>37</sup>生活在白羊城的人群，在「所城」軍事系統的官兵外，還有哪些人群，從而探討白羊城的發展狀況。一方面，隆慶二年白羊城隍廟的創建值得關注。

嘉靖三十年，白羊城創建天仙宮；嘉靖四十二年（1563），白羊城重修承恩寺；嘉靖四十五年（1566），重修關王廟；隆慶元年，重修天仙行宮；隆慶二年，創建城隍廟。

碑陰捐助修建寺廟的人名可以反映出當時白羊城人群狀況。下面分別列出：

一、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

欽差分鎮橫嶺路參將都指揮楊撫綏安集民，咸得所贊畫武舉褚陽；中軍千戶張林贊、猷威、惠軍有暇力；本城掌印中軍操總等官李瀛、李國卿、□璋、崔尚武、張裕後、匡環、王歧、樊琪、朱臣；太醫院官孫繼祖，先後綜理勤勞保育，故樂以襄事，督工頭目張世勳等，籌度匠技與有勞役於例得□□□。隆慶元年孟夏丙戌兵部咨送軍門贊畫武舉晉絳衛鎬撰並書。本城鑄字張明。

碑陰

欽差統領保定達官軍舍都司何天爵，千總吳芝，把總高永，周鶴年。

本城百戶尹鐘，總旗楊玉佩、羅營、劉環、王惠。

倉大使王愛，攢典熊耀。

商人常聰、姚斌、趙鏞、成文義。

信士李昂、吳錦、宋綬、鄭廷美、謝朝用、解貴、李奇、李羅、馬相、成朝、金和、劉仲成、楊雄、李天隆、祁應權、祁應棹、馬奇、孫學、李本、劉仲才、張渭、王爵、楊朝、王錦、甄實、黃貴、馬銳、睢清、董儒、張山、王輯、任祥、李義、謝名、李廷佐、張銀、王瑞、夏萬金、艾學禮、張登、李□、尹宏、馬錦、王仲銀、徐安、杜福、董惠、曹銳、霍仲銀、馮仲銀、劉宣、梁保、楊遇春、張浩忠、劉甫求、秦川、劉章、蕭志兼、照淮、李山、張進忠、時臣、侯俸、侯爵、謝朝臣、高住、侯鍾、王相、李澤、趙喜、武江、李朝用、郭奉、劉世隆、申恩、張□隆、徐江、李仁、楊天佐、王敬、劉棟、李仲良、徐□、侯祿、侯勳、史進、牛堂、侯挺、徐洪、羅□、姚虎、劉月、劉美、曹仲金、李□、李大恩、□

□、段敖、樊勳、張保、劉朝臣、李祿、王成、安景豐、趙桃、高暘、高時、李□、□□、齊堂、李繼宗、朱堂、牛進、劉儒、胡秀、□萬、趙恬、郭學、孫萬良、張子經、霍茂、韓住、李乾、扈定、張永、劉貴、姚淮、安靜、馮蛟、盧堂、劉卿、王瓚、岳廷還、朱龍、吳天爵、朱廣、董□和、高仲文、劉雲、盧明、謝仲金、劉錦、□仲金、李滿倉、郭仲舉、匡現、張□、潘相、梁世祿、劉萬良、周權、王清、李淮、任澤、趙策、李玉、楊寧、王孝、王守道、李名、耿全、王甫用、李英、楊銀、王遇、李松、李大興、張經、李盡忠、安宗、吳相、谷豹、趙準、許得才、楊虎、周羊、張廷槐、陳貴、陳忠、任滋、高寧、李仲朝、徐忠、張浩恕、杜茂、匡璋、王棟、陳策、趙相、郭靜安、張保、董朝用、楊真、扈志廷、實彬、劉仲金、張榮、王樸、楊天王、王智、朱昂、周楫、徐章、劉得水、王鉞、劉守忠、樊學、郭大川、魏魁、朱慶、張憲、曹奉、王隆、王淮、劉虎、馬保、王大金、韓倉、孫仲文、趙學詩、王保、尤惠、王應節、楊相、蘇林、朱惠、何相、張洪、丁澄、朱隆、柴紀、楊才、姚忠、袁保、張佐、王虎、戴賢、薛虎、劉伯春、楊春、王用、霍仲金、周豹、馬朝、王才、劉滋、李進長、郭文章、朱思恭、郭天祿、王朝佐、張純、侯鎮、王住、郭乾、郭坤、安其民、安□宅、張忠、李祿、李忠、段昇、司仲金、王嘉瑞。

致仕官催仲相，施二門外地基梁友、李懷恩，漆園樹彭高、趙得言、牛仲金。

長陵衛信官許謹。

山東民兵營把總王日然、劉文煥。

義男陳一誠、雷應時、孫成仁、朱□祖、王勳、蔣英、朱林、黃海捐、李計信、孫良富、李元亨、許文英、王富鳳、劉應斗、馬馴、張世棟、梁丙、李東垣、□

景陽、李文進、丁尚賢、趙□、牛相用、于邦棟、李思政、楊守義、荆學詩、李文申、郭奉晉、黃登、趙應奎、薛應時、侯國棟、李世成、葉琇、劉漢、劉長、楊榮、高宗太、張方良、石閨、蘇奉、王守信、□文爵、王臣、馬□、鄧承□、崔文□、趙射策、劉憲楨、張守恭、劉計祖、史九德、張守高、位士敬、張彥浩、于維先、蔡宗儒、孫朝用、馬成才、□九期、張奉、史□、石瑤、邢書、張□、岳濟武、閻朝□、周文通、張□、于廷戶、張由、楊世隆、丁世淮、蓋東山、隨朝、徐和、張岫、李在賓、王應時、于化、王承□、石天只、朱□、牛□、吳臣、朱威。本廟焚修主持陳全禮。

三官廟主持寇演朋。

天仙廟主持王太享。

繪塑匠唐廷輔，木匠楊相，鐵匠徐成，石匠王瓚。<sup>38</sup>

## 二、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

欽差分鎮橫嶺等城參府楊公，留心廟貌協謀益恭，庶幾從□□□□。

隆慶二祀春正王月之吉晉絳□齋 衛鎬撰，本路中軍官張林同樹。

### 碑陰

謹將施財暨效事官庶芳名並刻於後：

欽差管理保定達軍都司何天爵，本營中軍官安相，千總官吳芝，把總周鶴年、王永昌。本城守禦千戶所掌印百戶李瀛、本所正千戶張裕後、百戶尹鏜、朱臣、樊祺、周國忠。中軍衛鎮撫高獄，管操把總官百戶張勳、崔尚武、巡捕千戶田璋。

致仕官崔仲相，督工頭目張世勳，會首募緣善人申穩、李明、張萬。

統領山東民兵中軍武舉指揮黃甲，把總指揮郝府，坐隊官王用賢。

尹允、侯祿、劉貴、高時、安宗、□奉、王虎、睢紀、劉齊臣、張子京、李義、王得

水、曹林、王鉞、齊堂、高仁、謝朝用、王智、李□青、李大成、曹奉、楊雄、梁友、牛堂、王棟、吳相、羅清、扈定、柴紀、謝仲金、張保、董朝用、李成、朱惠、徐安、劉守中、王暹、任澤、王瓚、時臣、李朝、劉章、朱龍、侯俸、高暘、王仲銀、梁世祿、梁世膏、張佐、楊朝、李相、梁保、張增、杜茂、王爵、徐洪、趙相、朱慶、李仲良、謝朝用、楊相、□湖、谷豹、匡現、郭仲舉、侯勳、魏魁、劉良、郭奉、馬相、李仁、李大銀、張進忠、樊學、馬瑾、李澤丁、澄化萬、劉美、陳忠、李懷恩、許天祿、朱虎、王鈞、甄實、李大龍、鄭廷美、王相、劉如、馬甫、馬銳、曹仲銀、高仁、匡祿、侯爵、高仲文、王楫、董惠、董僑、高傑、李朝用、□□、薛虎。

保定營善人吳棟、張豐、楊貫、吳大儒、梁琮、馬福、馬祥、王煥、米濟民、梁棟、商大紀、楊貴、韓儒。

本府家人姚權、張穩、張福、張祿。

境內廟宇道士寇演朋、王太享、陳全禮。

### 諸技工作

鑄字張明，畫使王瑞、男王守道，木匠鄭廷秀、劉守正、楊相，泥水匠李得、李山、李海，石匠梁銀，鐵匠賈相。

山東（撫按）委管民兵營錢糧德州左衛經歷高嵩。<sup>39</sup>

## 三、隆慶六年《天仙行宮碑》

永陵衛 誠心施助信官孟安。

欽差白羊口遊擊將軍徐麟。

欽依守備白羊口等處都指揮戚維忠。

欽依守備白羊口等處都指揮張涇。

本所掌印官李瀛，致仕官崔仲相，千戶張裕後，百戶張勳、尹鏜、崔尚武、樊祺、朱臣、周國忠。

倉大使孫瓚，攢典高還、汪用楫、官舍尹宋張紹、匡現、匡祿、周宗祖。

信官汪□濬，總旗李計宗、王宗政、楊玉佩、劉環，商人姚斌、趙鏞。

碑陰

施財善庶芳名

李明、申穩、張萬、梁永、侯祿、□□□、郭仲舉、侯爵、王爵、劉貴、馬錦、王暹、張洪、孟得、楊朝、高仲文、高暘、高時、徐洪、王相、劉仲金、王住、牛堂、周權、侯勛、張佐、董□和、董□山、朱惠、李佑、王惠、李澤、丁相、劉□趙相、杜福、甄實、齊堂、楊天王、朱慶、王智、劉宣、安宗、曹銳、董惠、任祥、曹奉、劉章、李天龍、郭奉、李仲良、鄭廷慶、許得才、安其民、董儒、潘照、王住、李朝用、張涇、馬相、馬春、趙喜、李義、劉美、楊才、侯□、王棟、趙庫、劉升、辛倉、馬銳、牛恩公、崔倉、李忠魁、劉相、劉功、袁保、劉仲銀、郭志得、高寧、崔成、王保、寧進忠、曹棟、田紀、霍仲銀、盧志廷、侯乾、李懷恩、米保、陳忠、霍銳、徐章、盧名、霍仲保、劉自智、徐銳、董仲銀、馬保、李□良、王仲金、劉瓚、馮永紀、解祿、周豹、王甫成、朱相、化萬、朱保、張敖、劉守中、謝朝臣、楊玉春、王仲銀、李仁、高臣、張子經、韓倉、李廷佐、陳美、李本、吳世隆、杜祿、謝朝用、劉得水、朱龍、李進忠、劉萬良、韓住、谷祿、謝奉、劉仲金、董川、王嘉瑞、郭坤、吳天爵、曹來、段卿、張文吉、呂保、薛虎、霍義、吳倉、耿章、王奉、李天奉、姚才、咎萬良、石仲金、孟朝珮、李彥虎、王春、屈子貴、劉大金、張世良、張爵、蘇天福、李良、楊守義、劉廷臣、李承恩、申恩、朱頂、張全、柳淮、董保、秦奉、劉景、田經、解堂、王青、王淮、曹林、任甫、楊真、耿全、劉卿、劉臣、張浩忠、張浩恕、郝林、張保、李中、柏金、王瓚、姚忠、時臣、楊布澤、韓宗仁、魏魁、楊相、陳銳、王楫、王□□、牛貴、郭寸仁、王世登、劉登雲、王月、楊寧、牛進、劉惠、徐成、徐江、趙□詩、王應楫、許天祿、劉世隆、李住、劉栢春。

各口善人祝天福、羅倉、劉甫永、賈和。

保定大寧都司忠順官舍梁保、楊□、朱仲官、高得、田敖。

信官女善人李夫人張氏，張裕後母陳氏、劉氏、夫人崔氏，尹鏜母彭氏、夫人周氏，崔尚武母盧氏夫人王氏，樊門夫人沈氏，舍人尹銳母馬氏。

眾善信女申門楊氏、男妻蕭氏、侯門崔氏、劉門栢氏、董門王氏、王門韓氏、杜門郭氏、楊門張氏、王門李氏、李門安氏、梁門柴氏、李門萬氏、李本母王氏、韓門何氏、李氏奴雲、馬門王氏、李門陳氏、郭門李氏、徐門程氏、趙門高氏、張門崔氏、袁門朱氏、徐門安氏、王門范氏、馬門李氏、李門侯氏、董門劉氏、張門劉氏、王門任氏、劉門莫氏、劉門侯氏、馬門郭氏、劉門郝氏、劉門賀氏、田門程氏、劉門高氏、正門李氏、王門王氏、趙門楊氏、王相母余氏妻金氏、魏門郝氏、李門邸氏、李門葛氏、火門李氏、耿門李氏、崔門閻氏、牛門□氏、任門劉氏、劉門劉氏、劉門錢氏、張門張氏、樊門梁氏、張門樊氏、陳門馬氏、劉門李氏、孟門徐氏、張門孟氏、楊門王氏、王門郭氏、張門馬氏、郝門孟氏、郝門楊氏、劉門沈氏、劉門李氏、楊門王氏、冉門安氏、韓門張氏、高門蘇氏、王門董氏、張氏秀金、劉門劉氏、皮氏會山、蘇門賈氏、朱門張氏、高門尹氏、王門郭氏、徐門馮氏、甄門李氏、侯門楊氏、劉門金氏。

本廟主持道士王太享。

施捨地基功德主趙恬，室人甄氏、侯氏、張氏，男趙惟臣、孫男趙應武。

隆慶六年孟夏上吉日立

畫師王瑞，鐫字張明，石匠王瓚、梁銀、張仲銀。<sup>40</sup>

## 1、軍事體系與非軍事體系人群身份

### a) 軍事系統：守禦千戶所

守禦千戶所是明朝衛所制度中的一種特種編制，不隸屬於衛，直屬都指揮使司。

碑文所見，屬於白羊城守禦千戶所體系的人有：本城百戶尹鏜，總旗楊玉佩、羅營、劉環、王惠。本城守禦千戶所掌印百戶李瀛、本所正千戶張裕後、百戶尹鏜、朱臣、樊祺、周國忠。千戶張裕後，百戶張勳、尹鏜、崔尙武、樊祺、朱臣、周國忠。

另外，在明代中後期省鎮營兵制編制形成，景泰至弘治時期，北邊明確了營伍制度，營的編制是五人爲伍，50人爲隊，500人設都指揮或把總，之上設中軍一員。這一時期，確立了鎮守總兵、分守參將及守備的上下體系。<sup>41</sup>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兵部尙書余子俊奏准，只有總兵可稱爲鎮守，其餘「若副將、參將與主將，同在一城者，名爲協守；副將、參將、都督獨守一路者，名爲分守；都指揮、指揮獨守一城一堡，不受主將節制者，亦名爲分守；受節制者，則名守備，同事內臣稱號如例。凡一切僭稱名色，交代日悉宜更定，以正名分」。<sup>42</sup>

正德以後，以北邊爲代表，諸鎮定設正兵營、奇兵營、遊兵營、援兵營，至萬曆時期，鎮營編制逐漸完備。<sup>43</sup>明代中後期各鎮營的建置可以概括爲營、司、隊、伍之制。由低到依次爲，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每隊設管隊官一至二名。隊之上十隊爲司，每司五百人，設把總一人。再往上爲部，每部兩司約一千人，設千總一人。全營設「正兵營除了設坐營中軍官專司宣傳號令而外，有時也設立遊擊將軍以統領營兵。坐營中軍官」<sup>44</sup>（又稱「中軍官」或「坐營官」）一名，另設營將一名統領全營。

據此，屬於省鎮營兵制體系的有：欽差分鎮橫嶺路參將都指揮楊，本城掌印中軍操總。中軍衛鎮撫高獄，管操把總官百戶張勳、崔尙武、巡捕千戶田璋。欽差白羊口遊擊將軍徐麟。欽依守備白羊口等處都指揮戚維忠。欽依守備白羊口等處都指揮張涇。以上，也可以看出，在白羊城是由守禦千戶所的百戶、千戶，充當鎮營制中的管操把總等官的。

據《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記載「歲時督修守勤勞，春秋駐客兵防衛」。<sup>45</sup>又，《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記載「歷代白羊城爲都藩要地，主客

戍守居多。」<sup>46</sup>可見，白羊城除了衛所軍所充當的主兵，還有客兵輪戍。白羊城的主兵主要是涿鹿中後守禦白羊城千戶所，而不同時期的「客兵」來源不同。嘉靖末年至隆慶初年的「客兵」與「庚戌之變」有關。

#### b) 軍事系統：庚戌之變與「入衛軍」

嘉靖末年到隆慶初年，幾次修建的過程都有保定達官都司和山東民兵營軍官的參與。可以推測，這裡的「客兵」或許是來自保定的達官營和山東的民兵營。嘉靖二十九年，發生了庚戌之變，「或曰居庸西有白羊諸口，庚戌大虜入犯，半自此歸。」<sup>47</sup>又，「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由古北口突犯京師，欲奪白羊口北出，不果。」<sup>48</sup>一方面，白羊口被侵犯，另一方面，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變，使得北邊的防守體系發生了變化。

嘉靖庚戌之變後，明廷逐漸把防禦京師的重心轉移到薊鎮。包括撤回北直隸地區的京操軍、改京操軍爲邊操軍，以及調取入衛軍兵入戍薊鎮。所謂「入衛兵」制度是指明廷抽調「九邊」重鎮中的「七鎮」軍兵到京畿地區的薊鎮和昌鎮輪流戍守的制度。<sup>49</sup>入衛兵的基本職責是「禦虜」，防禦的手段多種多樣，分區防守、分關隘哨堡布兵是最重要的方式。入衛軍兵分別編入各區分守，方法大致是：「議照薊昌二鎮，先年分爲十區，每區俱派入衛客兵一枝，以備截殺。」<sup>50</sup>入衛兵各有其相對固定的區域，作爲「客兵」，他們又與「主兵」（當地駐軍）和其他客兵（京操軍、邊操軍、民兵和募兵）等協同防守。《明會典》記載，「又議准山東民兵，自四十三年正月爲始，務選足三千之數，推參將一員訓練，每七月初旬赴薊鎮防禦。」<sup>51</sup>由於當時白羊城屬於昌鎮，而昌鎮的防守隸屬於薊鎮。可以推測山東民兵營曾作爲入衛兵即「客兵」駐守白羊城。所以三塊碑文中會出現「山東民兵營把總王日然、劉文煥」；<sup>52</sup>「統領山東民兵中軍武舉指揮黃甲，把總指揮郝府，坐隊官王用賢」；<sup>53</sup>「山東（撫按）委管民兵營錢糧德州左衛經歷高嵩」<sup>54</sup>的記載。

此外，三塊碑還出現了「欽差統領保定達官軍舍都司何天爵，千總吳芝，把總高永，周鶴

年。」<sup>55</sup>「欽差管理保定達軍都司何天爵，本營中軍官安相，千總官吳芝，把總周鶴年、王永昌。」<sup>56</sup>「保定大寧都司忠順官舍梁保、楊□、朱仲官、高得、田敖」<sup>57</sup>的記載。

達官軍比較固定地參與京畿地區的戍守，也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變」以後，這與當時推行的「薊鎮入衛兵」制度相一致。隆慶二年，已經到薊鎮等地戍守十餘年的達官軍正式更名為忠順軍。<sup>58</sup>忠順軍以沿革的營兵制組織管理。有「保定忠順營」和「定州忠順營」，週期性地到薊州鎮和昌平鎮參與到入衛戍守，也就成為二鎮的「客兵」。<sup>59</sup>保定忠順營，設都司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五員，額兵1,500名，來到白羊城的應該是保定忠順營。

保定忠順都司，是專一管理達官、達軍和舍餘等達官的最高長官；相對獨立的軍政管理組織，並不直轄於地方軍衛有司。另外，還有在邊地戍守修建之責。忠順營組建之後，其職責不再像「庚戌之變」之前只是臨時抽到各地征戰戍守，作為入衛兵的一部份，他們也全面地參與到京畿地區薊鎮、昌平二鎮的防禦和邊牆的修建。保定忠順軍戍守地在昌平鎮，「每春防駐紮橫嶺路防守。」<sup>60</sup>在薊、昌二鎮防守時，忠順軍餘其他軍兵種協同分工（京軍、京操軍、入衛軍兵、旗軍舍餘、募兵、鄉兵和民兵等）統一聽從分區管領官，如巡撫、總兵和副總兵官的指揮。<sup>61</sup>

### c) 非軍事體系：

碑刻中除了守禦千戶所和入衛軍這些軍事系統的人群，我們還能看到很多非軍事系統的人群，下面將對這些人群做一分析。

前文已經提到，從嘉靖三十年起，白羊城創建了很多廟宇。包括：嘉靖三十年，白羊城創建天仙宮；嘉靖四十二年，白羊城重修承恩寺；嘉靖四十五年，重修關王廟；隆慶元年，重修天仙行宮；隆慶二年，創建城隍廟。這些廟都有哪些人去拜？這些人之間是否有所關聯？從這些人群身份，試圖勾勒出白羊城地方社會的一些情狀。因天仙行宮的碑陰捐助者身份記載最多，故以天仙行宮碑為主進行考察，並結合其他兩塊碑刻進行比對研究。

天仙行宮創建於嘉靖三十年，隆慶元年重修，《天仙行宮碑》<sup>62</sup>碑陰「施財善庶芳名」210人，沒有記載這些善人的身份，結合其他碑刻，發現「施財善庶芳名」排在最前面的李明、申穩、張萬三人以「會首募緣人」的身份出現在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碑中。「會首」暗示當時在白羊城存在着某種民間組織。李明、申穩、張萬三者的名字排在最前，或許他們在《天仙行宮碑》中也是「會首」，他們均參與到兩個廟的修建中，也會到兩個廟中祭拜，這個「會」的成員或許也參與其中，為兩個廟的信士。或可知，嘉靖末年至隆慶初年，這個民間組織在白羊城已有一定規模。

「施財善庶芳名」210人中，除了「會首」三人，有42人以「信士」的身份出現在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同時出現在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中，他們是：侯祿、郭仲舉、侯爵、王爵、劉貴、馬錦、楊朝、高仲文、高暘、高時、徐洪、王相、牛堂、侯勛、張佐、朱惠、李澤、朱慶、趙相、甄實、齊堂、王智、安宗、董惠、曹奉、劉章、郭奉、李仲良、李朝用、馬相、李義、劉美、王棟、馬銳、陳忠、王仲銀、李仁、朱龍、薛虎、張保、時臣、魏魁。

嘉靖末到隆慶初，這42人同時參與到了天仙行宮、關王廟和城隍廟的修建中，也是到三個廟中祭拜的「信士」，或許他們需要依靠相同的信仰來實現某種利益。此外，關王廟的住持陳全禮、三官廟主持寇演朋和天仙廟主持王太享都出現在關王廟和城隍廟的碑記中，一定程度上也說明這三種信仰之間沒有衝突，甚至有所合作，三個廟之間存在某種關聯。

此外，「施財善庶芳名」有46人是以「信士」的身份出現在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中，他們是張洪、劉仲金、王住、周權、董□和、杜福、楊天王、劉宣、曹銳、任祥、許得才、安其民、董儒、王住、趙喜、楊才、袁保、高寧、王保、霍仲銀、徐章、馬保、周豹、謝朝臣、張子經、韓倉、李廷佐、李本、劉得水、劉萬良、韓住、王嘉瑞、郭坤、吳天爵、申恩、王



淮、楊真、耿全、劉卿、張浩忠、張浩恕、姚忠、楊寧、牛進、徐江、劉世隆。加上上文所說的42人，關王廟與天仙廟共有88人相同。這88人先於嘉靖四十五年修建關王廟，又於隆慶元年進行天仙廟的重建，此外，王暹、劉守中、曹林、王楫、許天祿還出現在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中。這些人爲甚麼要參與並信仰兩個或以上的廟，原因有待進一步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施財善庶芳名」中有些人物也較爲特別。王惠，以「本城總旗」的身份出現在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中，可見，軍人也是來拜關王廟和天仙宮的，而在天仙宮碑陰中不強調其軍人身份。李懷恩以「施舍地基者」出現在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和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碑記中。楊守義以「義男」的身份出現在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中。王瓚同時是關王廟的信士、石匠，城隍廟的信士和天仙廟的石匠。楊相同時是關王廟的信士、木匠，城隍廟信士和城隍廟木匠。三個不同的信仰卻擁有着同一部份相同的「信士」，可以推測，在嘉靖末隆慶初年，白羊城已經有一批人同時拜着不同的神靈。

《天仙行宮碑》碑陰中還出現了很多女信士的身影。這些女信士分成兩種，一種是「信官女善人」，一種是「眾善信女」。前者是軍官的母親或妻子，如信官女善人李夫人張氏，張裕後母陳氏、劉氏、夫人崔氏，尹鐘母彭氏、夫人周氏，崔尙武母盧氏夫人王氏，樊門夫人沈氏，舍人尹銳母馬氏。當時張裕後爲本所千戶，尹鐘、崔尙武、樊祺爲本所百戶。<sup>63</sup> 當時的衛所軍可能攜帶妻子母親等家人來此駐防，逐漸在此定居。「眾善信女」有80多人，這些女性中有明確丈夫身份的是「李本母王氏、王相母余氏妻金氏」。而李本是天仙宮、關王廟的信士，王相是天仙宮、關王廟和城隍廟的信士，這些人或許是「鄉耆」。據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記載，「鄉耆王得水暨眾信人申穩、李明、張萬等各施己財，奔走于役，不疾不徐，而告成焉。」而王得水的名字出現在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善人名單中。這些「鄉耆」及其家人參

與到其中，提醒我們在嘉靖末年白羊城人群的複雜性。

此外，《天仙行宮碑》中還記有「各口善人祝天福、羅倉、劉甫永、賈和」，說明白羊口與居庸關的隘口城堡之間有聯繫，來拜天仙行宮的還有其他堡城的居民，此廟的影響力較大。還有「保定大寧都司忠順官舍梁保、楊□、朱仲官、高得、田敖。」梁保是關王廟和城隍廟的信士，說明這些外來的軍官也逐漸參與白羊城的信仰活動中。

據《天仙行宮碑》記載：「時遇嘉靖辛亥（嘉靖三十年）大地人災害，甚深不安，無處祈禱，善人趙恬等身心恐懼，化請本地大眾謹發誠心，望泰山天仙聖母聖位，焚香拜告，保本城內外大小軍民人等，平安無災，修建天仙聖母行宮一座。」「施舍地基功德主趙恬，室人甄氏、侯氏、張氏，男趙惟臣、孫男趙應武。」說明在嘉靖三十年之前趙恬一家在白羊城已經擁有大量的土地，施捨土地修建天仙行宮，隆慶元年，趙恬一家繼續參與重修。

《天仙行宮碑》中還有商人的身影，「商人姚斌、趙鏞」，在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的碑陰也有商人常聰、姚斌、趙鏞、成文義。在修建關王廟和天仙行宮的時候都有出資，推測爲此地較大的商人。可見，在嘉靖末年到隆慶二年這裡已經有商人的貿易，此地形成可以進行貿易的市場。

通過以上分析，三塊碑刻的碑陰所列捐資者的名單，可以看到，嘉靖末年到隆慶初年，白羊城內除了防禦千戶所的官兵，保定達官營和山東民兵營等入衛客兵外，至少還有商人，倉大使，募緣會首（民間組織）、眾多的善人（包括各口善人）、信士、信女，軍戶義男、家人，三官廟、天仙廟、承恩寺的主持，督工頭目，各種工匠：繪塑匠、木匠、鐵匠、石匠、泥水匠、畫師、鑄字者。這些身份之間或有重合，基本可以看出，至隆慶二年，白羊城不僅有本地鄉民，還有調戍而來的軍官及其家屬、民間信仰組織及商人等，軍、民、商「合作」修建三座廟宇，雖然尚不知「合作」原因及如何達致共同修廟。值得

注意的是，據碑文內容，三座廟均在守備張涇的支持下修建。如「嘉靖癸亥春，欽依守備張公諱爵，初次行香偶見，喟然在心，即命公廠燒造捐出俸資，仍口工匠刻日修理，復招善人李明等論眾相協。」<sup>64</sup>「欽依守備白羊城地方都閫鳳崗張公來任，外築邊垣，內飭戰具，政暇察民，欲于東門內創建關王廟，捐俸置地，鳩工庇財，將襄其事。」<sup>65</sup>當時只有軍事系統在管理地方，而沒有州縣行政系統。

值得注意的是，關王廟的贊助人中有87名「義男」，城隍廟的贊助人中有四名「本府家人」。這些「義男」是甚麼樣的人群？他們有怎樣的來歷？「義男」楊守義又出現在《天仙行宮碑》中的「施財善庶芳名」中。若為衛所武官所蓄養的「奴隸」，為甚麼會出現在捐錢碑中？于志嘉認為明代國家對軍戶內蓄養家人、義男的現實情況，採取了默認的態度。另一方面，衛所武官蓄奴是國家授予的合法權益，世襲武官與世襲衛軍之間也常形成私的隸屬關係，加上自願帶丁糧投靠衛官者不在少數，衛官蓄奴更是常態。衛選簿中不少以家人、義男承充軍役的記錄，特別是在元末明初動亂之際，常見被指名充軍之人為逃避軍役，以義男頂替自己姓名充役，繼而又有義男之子「戶名不動」繼役的情況。義男或其後代一旦因功升為武官，常申請復姓獲准，以此斷絕義父子孫爭襲武職的機會。由於軍戶同時需要承擔軍、民二役，負擔特別沉重，更加重了對家人、義男的需求。<sup>66</sup>隆慶初年，可以看到在白羊城至少有將近百名「義男」承充軍役，可見，存在着軍戶逃役的現象，這些「義男」依附於衛官，本應隱藏的在衛官家中，現在卻出現在碑文中，捐錢修廟，可見「義男」勢力及地位增強。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且他們的來歷尚不清楚，有待結合其他材料考察。

總之，從這些諸色身份中，可以看出直至隆慶二年，有不同的人群及民間組織，修建寺廟、參拜寺廟等活動是他們相互聯繫的面向之一，白羊城已非一個單純的軍事防禦性的「所城」。

## 2、白羊城城隍廟的創建

日本學者濱島敦俊認為，按照各行政區域的級別，規定其祭祀對象。州縣層面，以祭祀城隍廟為中心，由知州、知縣各自負責祭祀山川風雨雷霆城隍壇、社稷壇、城隍廟、邑厲壇及其他祀典所欽定的人格神。在鄉村層面上，從里社壇、鄉厲壇到最基礎的各戶祖先及灶神的祭祀被許可，並責成是義務。《禁淫祠制》規定了各戶祭祀祖先、灶神的制度，鄉村里社壇、鄉厲壇及其上層州縣的「城隍」祭祀。<sup>67</sup>他分析了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年（1369-1370）的祭祀改制，認為在洪武三年，廢除所有城隍神的封爵，天下的城隍廟就簡化為京都（應天府）、府、州縣三級，形成與現世皇帝統治相對應一元化城隍序列。<sup>68</sup>出現了與行政機構相對應的城隍神。這樣，原來作為「城市守護神」的城隍神，逐漸變成帶有「一定行政區域守護神」乃至「一定行政區域的冥界管理者」的特性，隨着明初的制度化，城隍神被賦予了和現世的知府、州、縣分別對應的冥界行政官的特性。<sup>69</sup>

由此可見，按照禮制，只有府、州、縣層級才能修建城隍廟，最低級別到縣。但在隆慶二年時，白羊城守備張涇創建城隍廟，有悖朝廷規定的禮制。據《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記載：

欽依守備白羊城等處都閫鳳崗張公分轄斯地，外修邊垣，內飾城堡，足以拱衛畿輔焉。重寄政暇謂僚吏曰，凡為郡縣各設城隍之神，所以主茲土之靈秀，恤氛戾應祈禱，而默相政治者也。

在分析作為非縣級城市的白羊城卻可以創建城隍廟的情況前，需要關注濱島敦俊對於江南城隍信仰的研究。濱島敦俊認為明清時代的城隍信仰產生的一個變化就是，明末清初以後，在比較下層的聚落中出現了城隍廟。他進一步分析，本來只有縣級以上才有的城隍廟，發展到下層的聚落，其根源是這一地區的商業化和在這基礎上的市鎮——小城市的發展，進一步可以想象江南市鎮作為「城市」開始「自立」。但是，可以確

定，鎮城隍的發展，與其說是江南市鎮作為城市要求自立、自治——這從城隍廟即「城市守護神」的概念出發很容易聯想到，倒不如說它希望把自己置位於首都—省府—府城—州縣各級行政序列的下層。這從中國官僚制社會的特性來看是毫不奇怪的。」<sup>70</sup>雖然濱島敦俊是以江南的市鎮為中心展開研究的，但是他的分析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發。

白羊城守備張涇所言「凡為郡縣各設城隍之神」，從碑陰所載捐助者的身份來看，主要是本地守禦千戶所的軍官、保定達軍營都司等官和山東民兵營的軍官，說明白羊城修建城隍廟也得到了他們的認可。作為堡城的最高官員「守備」及當地人心中，白羊城此時已經成為一個城鎮，城裡有固定的大商人、信士、匠人等多種人群聚居，有社學、倉場等，需要創建供奉「城市守護神」的廟宇，白羊城由軍事性的「所城」向城鎮發展，逐漸「自立」的趨勢。另外，守備張涇只言「凡郡縣各設城隍之神」，或許並非想把白羊城置於首都—省府—府城—州縣各級行政序列的下層，而欲爭取與州縣體系中的縣級城市類似的地位。

## 五、餘論

本文利用位於現今北京市昌平區羊城村的四塊明代碑刻，結合相關文獻，對居庸關隘口城堡白羊城的發展做了個案考察。筆者認為從正統十四年到隆慶六年，白羊城經歷了從一個衛所堡城發展成為有着多種人群活動的城鎮的過程。

碑刻作為一種文本的形式，能提供給我們豐富的資訊及諸多線索。碑刻同樣也有其生產過程，但因材料有限，我們很難還原此過程，只能結合其所在的空間位置和相關文獻，對碑文記載的內容做詳細考察。若能在田野工作中，找到其他文獻，如碑陰中軍戶的族譜等，或許能呈現給我們一個更為生動的地方社會。另外，關於明代前期的「土木堡之變」的研究，多是從政治角度探討，筆者認為可嘗試結合地方文獻，來探討土木堡之變及其對地方社會產生的影響，以及地方社會是如何應對的。這裡只是探討了白羊城大致

發展的情況，很多細節還未深入探討，若日後還有餘力，需要對一系列隘口堡城進行研究，考察它們發展的軍事、經濟、社會因素和背後機制，探討關隘城鎮的特質所在。

## 註釋

- <sup>1</sup> 嘉靖四十三年《重修承恩寺記》、隆慶元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隆慶二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隆慶六年《天仙行宮碑》，以上四碑均位於今北京昌平縣北流羊城村。出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56冊。
- <sup>2</sup> 按：四塊碑刻的刻寫樹立時間與寺廟的創建、重修時間不同。嘉靖三十年，白羊城創建天仙宮；嘉靖四十二年，白羊城重修承恩寺；嘉靖四十五年，重修關王廟；隆慶元年，重修天仙行宮；隆慶二年，創建城隍廟。而刻寫樹立時間分別是：《重修承恩寺碑記》：嘉靖四十三年；《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隆慶元年；《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隆慶二年；《天仙行宮碑》：隆慶六年。
- <sup>3</sup>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86，志36，頁1029。
- <sup>4</sup> 《重修承恩寺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01。
- <sup>5</sup>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11，頁479。
- <sup>6</sup> 楊博，《復保定巡撫劉隅等經略紫荆關隘疏》，載於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卷274。
- <sup>7</sup> 《重修承恩寺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01。
- <sup>8</sup> 衛鎬，《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0。
- <sup>9</sup> 《重修承恩寺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01。
- <sup>10</sup> 桂榮，《邊情緊急乞添設將官查處隘口以禦戎虜疏》，王士禛，《西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頁181。

- <sup>11</sup> 王士翹，《西關志》，頁24。
- <sup>12</sup> 蕭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49。
- <sup>13</sup> 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二，《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010冊，頁73。
- <sup>14</sup> 楊溥，《楊襄毅公本兵疏議》（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據明萬曆十四年刻本影印本），卷11，《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 <sup>15</sup> 張廷玉等撰修，《明史》，《職官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70，志44，頁900。
- <sup>16</sup> 《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1967），卷221，弘治十八年二月丁巳條。「（弘治十八年）改昌平縣白羊口巡檢司為唐家嶺巡檢司」。
- <sup>17</sup> 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卷1，頁43。
- <sup>18</sup> 張廷玉等撰修，《明史》，卷76，頁817。
- <sup>19</sup> 《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126，兵部，頁648。
- <sup>20</sup> 盧象升，《明大司馬盧公奏議》（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據清道光九年刻本影印），卷6，第25冊。
- <sup>21</sup> 蕭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頁50。
- <sup>22</sup> 衛鏞，《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0。
- <sup>23</sup> 衛鏞，《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4。
- <sup>24</sup> 張廷玉等撰修，《明史》，卷91，頁999。
- <sup>25</sup> 《天仙行宮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90。
- <sup>26</sup> 《重修承恩寺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01。
- <sup>27</sup> 丁楷，《緊急聲息疏》，王士翹，《西關志》，頁95。「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隘口，密邇大同，萬一虜賊深入，各關兵力寡少，戰守不敷。……將京營下班官軍選撥。……其居庸關，亦須查撥相應衛所官軍一千名，白羊口五百名。」
- <sup>28</sup>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1，頁479。
- <sup>29</sup> 屠僑，《處置邊關重要地方疏》，王士翹，《西關志》，頁99。
- <sup>30</sup> 同上。
- <sup>31</sup> 王士翹，《西關志》，頁29。
- <sup>32</sup> 參見于志嘉，〈明代軍戶中的家人、義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2012年9月），第3分冊，頁507-700。。
- <sup>33</sup> 王士翹，《西關志》，頁49。
- <sup>34</sup> 《明會典》，卷79，禮部37，頁456。
- <sup>35</sup> 衛鏞，《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0。
- <sup>36</sup> 張金奎，《明代衛所軍戶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257。
- <sup>37</sup> 按：隆慶六年是天仙宮立碑的時間，是四塊碑文重兵出現最晚的時間。
- <sup>38</sup> 衛鏞，《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1。
- <sup>39</sup> 衛鏞，《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5。
- <sup>40</sup> 《天仙行宮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90。
- <sup>41</sup> 蕭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頁280。
- <sup>42</sup> 《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1967），卷之184，成化十四年十一月戊午條。
- <sup>43</sup> 蕭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頁287。
- <sup>44</sup> 蕭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頁289。
- <sup>45</sup> 衛鏞，《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0。
- <sup>46</sup> 衛鏞，《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北京圖書館

- 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4。
- 47 劉效祖，《四鎮三關志》，頁73。
- 48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1，頁479。
- 49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頁137。
- 50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頁98。
- 51 《明會典》，卷131，兵部14，頁675。
- 52 衛鏞，《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1。
- 53 衛鏞，《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5。
- 54 同上。
- 55 衛鏞，《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1。
- 56 衛鏞，《白羊城創建城隍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5。
- 57 《天仙行宮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90。
- 58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頁138。
- 59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頁139。
- 60 劉效祖，《四鎮三關志》，頁94。
- 61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頁143。
- 62 按：白羊城天仙行宮的立碑時間是隆慶六年。
- 63 《天仙行宮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90。
- 64 《重修承恩寺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01。
- 65 衛鏞，《白羊城修建關王廟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6冊，頁151。
- 66 參見于志嘉，〈明代軍戶中的家人、義男〉。
- 67 濱島敦俊，《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頁114。
- 68 濱島敦俊，《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頁119。
- 69 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達與農民信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
- 70 濱島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達與農民信仰〉。